

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

杜玉玲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江西师范大学 图书馆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 康熙时期为了建构国家认同,在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推崇程朱理学。江西督抚大员及地方官绅秉承康熙旨意,在九江庐山区域掀起了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建设热潮。白鹿洞书院的兴复与紫阳祠的创建、秀峰寺的扩建与“僧名儒行”的寺僧超渊、木瓜洞的崛起与“亦儒亦道”的洞主石和阳,集中体现了满清王朝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策略。考察这一历史过程,有助于深化对庐山历史文化内涵的认识。

关键词: 康熙时期; 庐山; 国家认同; 文化建构; 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5)01-0125-07

DOI:10.13764/j.cnki.ncds.2015.01.020

清政权入主中原后,历经 30 多年的统一战争,平息了各地的反叛势力。然而,人民对清朝的国家认同尚未形成,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尚未确立。为此,康熙帝采取“巡幸与广赐翰墨”的方式,建构接续统治的政治认同与崇儒重道的文化认同^{[1] (P1-17)}。地处江西最北端的九江,素有“江西门户”“七省通衢”之称^{[2] (P1)},清初曾是南明政权抗清与“三藩之乱”的重镇^{[3] (P523-P528)}。在康熙朝建构国家认同的历史过程中,横跨九江、南康两府的庐山^{[4] (P19)}因其具有丰厚文化底蕴而成为这场国家建构的主场地。

庐山主峰海拔 1 474 米,北枕长江,东、南面濒鄱阳湖。大江、大湖与大山的浑然交汇,形成了庐山秀丽的风景,气候宜人,交通便利。自东晋以来,诸多佛教僧人、道教徒、士大夫和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庐山,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积累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东林寺与慧远僧团,标志着佛教的“本土化与中国化”^{[5] (P21-74)};唐玄宗敕建的“九天使者庙”,反映了民间道教的正统化与国家化^{[5] (P76-114)};朱元璋塑造周颠仙人与庐岳神,促成了庐山文化与王朝政治的结合^{[5] (P115-155)};朱熹复兴白鹿洞书院,清初创建紫阳祠,推崇儒僧与儒道,树立了庐山的理学道统^{[5] (P156-197)};晚清至民国时期,西方传教士凭借不

平等条约,到庐山租地、划界、建立“牯岭特区”,国人相继仿效,创建了“莲谷新村”“小天池新村”“太乙村”及“庐山三大公建”等新型社区,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过程^{[5] (P198-236)}。

在儒释道互动及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同文化因子不断被加入、改造、融合,最终形成具有多元文化结构的庐山文化系统。本文考察的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正是庐山已有的儒释道文化因子与异族政治统治相结合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一 白鹿洞书院的兴复与紫阳祠的专设

白鹿洞书院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隋朝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唐朝得到完善和发展,私家书院和村塾、书堂因此应运而生。江州庐山脚下的“李渤书堂”相传为李渤(773—831)兄弟中举之前隐居读书之所。李渤中举后,于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出任江州刺史,在原读书处“即洞创台榭,环以流水,杂植花木”^{[6] (P27)},是为白鹿洞之由来。升元四年(940),南唐政府“建学馆于白鹿洞,置田供给诸生,以李善道为洞主,掌其教,号曰庐山国学”。于是,白鹿洞成为南唐政权的正式书馆,专事

收稿日期: 2014-12-01

基金项目: 江西师范大学 2015 年规划项目(人文社科)“世界文化景观遗产视野下的庐山文献研究”。

作者简介: 杜玉玲(1977-),女,江西樟树人,厦门大学 2010 级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员,从事历史文献学、图书馆学研究。

藏书讲学。北宋初年,朝廷改“庐山国学”为“白鹿洞书院”,御赐经书及洞田,一度有“学徒数十百人”。南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面对庐山到处是“佛、老之宫”,而书院“一废累年”的现状^{[7] (P1 055)},为了重振儒道,大举兴复白鹿洞书院,筹措洞田,购置藏书,聘师招生,制订学规,奠定了白鹿洞书院的办学模式^{[7] (P1 054-1 074)}。历经元、明、清,白鹿洞书院都是在朱熹制定的制度框架下发展,因此成为理学传统在庐山的象征^{[8] (P26)}。

明清易代之际,白鹿洞书院并未遭受大的战争破坏,得以平稳过度。顺治七年(1650)、十年(1653)、十四年(1657),南康知府李长春(生卒年不详)、江西巡抚蔡士英(?—1675)等主持重修书院,“新圣殿,奠先师,禁侵溷,谕洒扫,清旧田,增新亩,谋修筑,糗糒粮,延师儒,立章条,规讲课”^{[7] (P1 259)},使白鹿洞书院的殿堂、斋舍、洞规、洞田、书籍、礼仪、讲学方式等皆一仍其旧^{[7] (P1 055) [9] (P32-34) [10] (P43-44)}。

康熙对白鹿洞书院格外垂青,于二十六年“钦颁御书‘学达性天’扁额及经史,遣官悬挂”^{[7] (P1 095)}。江西督抚要员及学政、司道大员等地方官绅,秉承帝王旨意,相继维修与重建书院的各种建筑,编纂书院志书,清理洞田,重新阐释学规,增设祠堂,更换圣贤诸像,等等。在整个康熙朝,此类工程前后不下15次之多^{[7] (P1 255-1 260) [9] (P32-37)}。其中康熙四十八年(1709)紫阳祠的创建,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时任南康知府的张象文(生卒年不详),曾亲历紫阳祠的创建过程,并撰写了《申覆朱子专祠文》、《紫阳祠记》及《文公朱子专祠碑记》,详细记述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兹引述《紫阳祠记》如下:

朱子守南康军,重辟白鹿书院,后迁浙东提举。鹿洞诸生立生祠奉,朱子闻而遗书撤之。歿后,开禧乙亥,复以周濂溪、程明道、伊川三夫子并祀宗儒,继以陆象山、王阳明二先生合祀焉。此朱子之祀所由来也。岁丁卯,我皇上颁赐“学达性天”扁额。初与大成殿“万世师表”同悬。夫“万世师表”尊宣圣也,“学达性天”崇紫阳也。今以紫阳之扁加宣圣之堂,于义弗协,余乃与学博熊君士伯言,鹿洞礼教攸关,其所以妥侑朱子者,有所未尽,须详明院司道宪,更于宗儒堂外择先贤旧址,特建祠一所,前后二进,专祀朱子,东西位配以鹿洞从事者

十有四人,颜其门曰白鹿洞紫阳书院。栋宇坚朴,规模弘敞,多士慰焉。盖濂溪莅南康军时,鹿洞久湮,二程未至鹿洞,望而祀之。象山来自金陵,讲义勒石,未曾专驻。阳明擒宸濠,游匡庐,憩鹿洞,手录《大学》、《中庸》古本,及独对亭题咏镌石立洞,兼置田养士,其功迹俱不可泯,统祀宗儒,宜也。朱子守南康甫二年,善政惠民,郡乘彪炳。惟经营鹿洞书院,立殿堂,请敕额,校书籍,置田亩,惓惓以昌明正学,教育人材为念。上以绍千圣道统之传,下以阐奕世师儒之绪。重荷圣天子眷注宠锡,良有以也。余忝任康郡,数年来冰兢职守,每坐六老堂,常怀惕若,用是肃俎豆,荐苹蘩,专祀朱子于凤泉云壑间,不亦宜乎!工始于某年月日,告成于某年月日。董其事者学博熊士伯,并识之。^{[11] (P58)}

在朱熹及其后继者的规划中,白鹿洞书院原有祭祀孔子及其弟子的大成殿(亦名“礼圣殿”)与祭祀濂溪、二程、朱子三先生的三贤祠。明代以来,在大成殿与三贤祠的基础上又增建了宗儒祠、先贤祠与忠节祠,祭祀对象也扩及朱熹的15名弟子、李渤等有功人士16人、曾经在此讲学的陆九渊、王阳明及历代忠于国家的陶渊明、诸葛亮等人^{[7] (P23, 165, 485, 784, 1 082)}。这一时期,朱熹在理学传统中的地位虽已逐步提升,但并未在白鹿洞书院的祭祀系统中得到特别的推崇。

康熙御赐“学达性天”匾额之后,朱熹的历史地位与象征意义得到了强化,创建专祀朱熹的“紫阳祠”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白鹿洞书院创建紫阳祠2年之后(1712),朱熹在孔庙中的配享地位由东庑先贤之列升为大成殿十哲之次,显示了清王朝对朱熹的特别尊崇。康熙五十九年(1720),星子县令毛德琦(生卒年不详)编修《白鹿书院志》一书,专门收录了《朱子升配十哲部文》,强调朱熹和白鹿洞书院在理学传统中的崇高地位^{[7] (P1 228)}。

康熙时期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可以视为清初文化建构的重要一环。从康熙御赐“学达性天”匾额,到白鹿洞书院的兴复、紫阳祠的创建,再到朱子升配十哲之次、《白鹿书院志》的编纂等等,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充分显示了康熙帝及其臣僚的文化策略。清代程朱理学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就是在这一文化政策与文化建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

二 秀峰寺的扩建与“僧名儒行”的寺僧超渊

秀峰寺原名开先寺,位居庐山南麓,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五代十国藩镇割据时期。据说,南唐中主李璟曾以太子身份避居庐山五老峰下,有村夫献地,为其建读书之所。李璟即帝位后,因“野夫献地为已有国之祥”,以书堂为寺,取名“开先”^{[12] (P213-218)}。由此可见,开先寺之于李璟的意义,即是国家主权的象征。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改寺名为“开先华藏”。行瑛禅师主持寺庙之时,开先之屋多达四百楹,“穷壮极丽”^{[12] (P219-224)}。元末,开先寺一度毁于兵火,明洪武、永乐、正统及天顺年间陆续修复^{[13] (P441)}。正德十五年(1520),王阳明(1472—1529)于平息“宸濠叛乱”之后登上庐山,在开先寺刻下了《纪功碑》: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宁藩宸濠以南昌叛,称兵向阙,破南康、九江,攻安庆,远近震动。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余党悉定。当是时,天子闻变赫然。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于赫皇威,神武不杀,如霆之震,靡击而折,神器有归,孰敢窥窃。天鉴于宸濠,式昭皇灵,嘉靖我邦国。

正德庚辰正月晦,提督军务都御史王守仁书。^{[13] (P442)}

在上述碑文的字里行间,透露了王阳明平叛成功后的喜悦与意气风发。所谓“神器有归,孰敢窥窃”,更是突显了开先寺之于国家主权的意义。在清初平息“三藩叛乱”后,开先寺的象征意义再次得到了强调,为康熙帝与江西抚臣反复利用。

康熙十八年(1679),清廷对付“三藩之乱”胜利在望,朝政的重点开始由军事转向内政,江西巡抚宋荦(1634—1713)即于此时上任^{[14] (P8-9)}。当时江西的地方政局颇为混乱,不仅有叛军和土寇作乱,而且吏治腐败、食盐昂贵、连年干旱,各种天灾人祸相继而来^{[15] (P188-192)}。为了稳定民心,消弭叛乱之源,宋荦把施政重心放在理学教化上,大举兴复书院、祠堂等文化设施^{[15] (P193-196)}。在他离任之前,专程上庐山游览,因而与开先寺僧超渊结缘,留下了一段佳话。此行陪伴其左右的有钱塘太学生吴允嘉(生卒年不详),他在《游开先记》中记述:

寺为南唐中主李璟创建。……左有十

笏堂,堂后聪明泉,读书台,俱以中主得名。台左有黄涪翁七佛偈、王文成纪功碑并镌石壁上。……余谓中丞曰:武宗盘游无度,宁庶人睥睨神器,阴蓄异志,积有数年。一旦师出蠡湖,攻围安庆,众号百万,何其烈也。而文成居蕞尔临江,集数员文吏,徒以区区忠义,激发人心,批吭捣虚,倾其巢穴、樵舍,转战火及楼船,宝玉美人,尽为灰烬。以彼数载之经营,而破之于旬日,厥功伟矣。昨戊辰之秋,楚氛弗靖,所在震惊,不逞之徒谋为响应,时公初莅西江,镇之以静,旋钩得首难者二人,置之国典,使燎原之势不炽,而反侧之子获安,是文成灭焰于既燃之后,我公消弭于曲突之先。岂不媲美古人耶!何于此磨片石纪之?中丞逊谢,遂不果。^{[12] (P325-329)}

吴允嘉面对李璟读书台、王文成纪功碑,联想到宋荦于1688年应付楚变、平息李美玉等叛乱之事,因而建议宋荦“于此磨片石纪之”,以显示其丰功伟绩。宋荦虽然并未采纳吴氏的建议,但却认同开先寺的象征意义,以兴复此寺为己任。

开先寺主持僧超渊和尚,号称“中兴开先秀峰初代心壁渊禅师”,原在南昌,由宋荦等官绅延请入主开先寺。据《庐山秀峰寺志》记载:“康熙壬申秋,师在洪州憩云庵,受江西巡抚宋公、南康太守李公、星子邑侯赵公暨合郡绅衿、诸山知识耆宿请,至十月二十二日入院。”^{[12] (P304)}超渊入主开先寺后,积极筹资兴复庙宇,扩充寺田,历时10年,“修整一新”^{[12] (P231-233)}。此后,宋荦与超渊频繁互通书信,并数次会面^{[12] (P369-380)}。宋荦对于开先寺的关注,重点并不在于宗教层面,而是试图使之纳入国家认同与儒学的范畴。他在《与秀峰心壁禅师》中说:

夏五后正有数行问讯方丈,寄《二家诗》、《沧浪小志》,想未到耶?侍者至,奉法帖,知和尚有滇池之行,万里宁亲,亦是佛门中一因缘大事,叹服叹服。率成古体一首赘卷后,并索尤邵二诗,差不虚兹行耳……客夏吴门得聆半偈,实慰夙心。……和尚禅心常定,道力愈坚,言念匡庐,不禁神往。^{[12] (P372)}

超渊“滇池之行,万里宁亲”,表明他虽然皈依佛门,犹不忘孝敬双亲,宋荦对此表示赞赏。在这里,为超渊的形象定下了基调。此后,随着康熙的御

赐翰墨与亲自召见,超渊的“僧名儒行”形象日益丰满。例如,新任江西巡抚郎廷极(1663—1715)称,超渊“学于浮屠,而能孝其亲友”^{[12] [P58-63]};江西学政王思训(生卒年不详)称,“吾儒有三不朽,超渊其立不朽于方外者欤”^{[12] [P69-74]};滇南旧史王翰(生卒年不详)称,超渊“既披剃出家,犹能念罔极之深恩,如是僧名而儒行”^{[12] [P3-6]}。释本庆更是以佛门长辈的身份,大谈“世间之孝”与“出世间之孝”之异同,认为“承欢膝下,事奉双亲”乃“世间之孝”,“广化群生、领众行道”乃“出世间孝”,二者应该是相融相通的^{[12] [P329-331]}。

超渊获得康熙的御赐和召见,可能是由于宋荦的举荐。据《庐山秀峰寺志》记载,“康熙四十二年,皇帝南巡至杭州,御赐《般若心经》一卷,送庐山开先寺供奉。……康熙四十六年,皇上南巡,开先寺僧超渊奉旨随驾至松江行宫,蒙敕赐御书‘秀峰寺’额。”^{[12] [P47-48]}在此之前,“宋荦在江苏,三逢巡访”^{[14] [P14]}。从宋荦与超渊的交友及上述事件的先后顺序来推测,宋荦在面见康熙时可能提到了开先寺与超渊和尚,否则很难解释康熙与开先寺及超渊和尚的因缘。在此后近20年时间里,超渊得到了抚臣张志栋(1648—1714)、郎廷极、白潢(1660—1737)等地方官绅的大力支持,改开先寺名为秀峰寺,全面修复与扩建寺庙建筑、增置寺庙产业、重新制定寺规、首次编修寺志,造就了开先寺(秀峰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12] [P53-74]}。

在朝廷、官绅与佛门长辈的期许下,超渊和尚打消了“入住佛门,不能孝敬双亲”的顾虑,积极塑造“僧名儒行”的形象。入主开先寺后,超渊重立了寺规,取名“丛林共住规约”,共10条。规约首条为“敦本尚德约”,明确提出“孝敬父母”与“遵守朝廷法令”,宣示了“忠君”与“孝亲”两大原则^{[12] [P317-320]}。与此同时,超渊入主开先寺后主持的各次宗教礼仪活动,无不体现了儒家“入世”与佛家“出世”共通的精神^{[12] [P304-305]}。在《庐山秀峰寺志》中,对超渊有如下记述:

心公尤异,甚具大法眼,为释氏津梁。四方来学之士,莫不响风景从,以致山陬海隅之地,罔不倾慕心公者。公则以禅鸣于天下,学有根底,语无泛涉,抽毫拈管,尤其所长。凡夫名公钜卿,缙绅先生,靡不加礼。心公则以诗歌、古文,鸣于一世,而且鸣于当宁。^{[12] [P479-482]}

由此可见,超渊作为“僧名儒行”的宗教领袖,在当时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康熙皇帝还是地方官绅,都试图拉拢和利用超渊,使之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志。

三 木瓜洞的崛起与“亦儒亦道”的洞主石和阳

明清之际,由于流寇和农民起义的冲击,庐山道观破蔽不堪。顺治至康熙年间的学者潘耒(1646—1708)在游览庐山时记云,“二十里抵山麓太平宫,唐明皇所创,以奉九天使者,形胜绝佳。宋元时尚弘丽,多前代物,白玉蟾之流栖托焉。今颓败不支,黄冠拾薪锄菜而已。”^{[16] [P47]}但与此同时,地处庐山南麓的木瓜洞却异军突起,成为众多抚臣与官绅注目之地。

木瓜洞又名木瓜崖,因唐朝道士刘混成修道其中而闻名^{[6] [P27]}。刘混成之后,木瓜洞一直处在沉寂状态^{[17] [P352]}。然而,这一状态却因“南阳石嵩隐筑室居此”而重又热闹起来^{[18] [P28]}。康熙五十八年(1719)星子县令毛德琦编纂的《庐山志》,集中收录了康熙时期一批抚臣与官绅为木瓜洞道士石和阳撰写的传记、墓志铭、书序及和诗等,解读它们会发现,这些地方官绅都不约而同地塑造了一位“亦儒亦道”的特异人物。

康熙癸巳年(1713),白鹿洞书院洞主汤来贺(1607—1688)在《石嵩隐先生传》中记云:

嵩隐先生,巢父之流,老氏之寄也。自言南阳人,姓石名和阳。当中州如沸时,早已韬光。氏族显晦,不得而考。初隐嵩山,故号嵩隐。所言皆六经四子之书,郭公都贤曾与讲论于岳麓书院,多赠答诗篇。嗣是李公本晟、王公泽弘暨士大夫之能重道者,而师之友之,次第相延,不惜策杖以应。计来庐山木瓜洞时,年五十有四。洞旧为混成子修真处。剪辟荆榛,大开厥胜,问字者无虚日。韩城刘公荫枢,见而叹为幽人贞吉。一日,立洗心亭,谓吾当厝于亭北。将逝,见群鹤飞来,坦然示众,有“风起白云收,行年八十九。仰天见明月,七星是北斗”及“守一抱元”之语,遂瞑。壬辰夏,大雨出蛟,崖崩屋绝,惟墓木如故,识者奇之。所著多湮没波涛,只存《黄庭》、《阴符》注解、《指玄篇》语录数种于别所。癸巳,学

博据舆论,达郡县。于是,郡首叶公谦详请阐幽,备载案牒;大方伯傅公泽渊表其间;督学冀公霖铭其墓,允著郡志。其徒尹博,广陵人,偕弟漂庐墓三载,视师如在焉。汤永宽曰:石隐哉,以和命名,是又介而和者也。道义声气之遍孚,宜矣。吁,儒耶仙耶?吾无以名其所至。^{[19] (P97)}

这位“读儒家书、交儒士友、著道家书、行仙者迹”的隐士石和阳,在当时引起了江西督抚大员、学政及南康知府、星子知县等地方官员的高度关注,因而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记载。康熙壬辰年(1712)任南康知府的叶谦,在当地父老的指引下,寻访了石和阳的墓地,并了解其生平事迹,获知“当世名卿大夫无不慕其风,尊其道”。他在《题石嵩隐序》中记云:

嵩隐,……幼治经精河洛书,及长,遭荆襄寇乱,遂隐居嵩山。慨然有轻云野鹤之志。……筑室于木瓜崖畔,……初与张敬一、章云崖、周北溟、钱伯常皆以儒修晦迹,枕流漱石,以激其清,饵芝餐霞,以韬其耀。于世味声利之事澹无与焉。……昔孔子周流楚泽,遇荷蓑丈人,而许以隐者,嵩隐得无类于斯欤?^{[18] (P28-29)}

康熙甲午年(1714),贵州巡抚刘荫枢(1637—1723)在《题庐山木瓜洞石道人嵩隐行略》中,详细记述了石和阳的“学问”:

余少宗孔孟之传,二氏之学从未参考。……点砂烧丹,吐纳运化,谓学道也。叩其中藏,诸魔横生。身踞蒲团之上,心驰九天之表。余尝遨游天下,所遇禅士羽林,惟问山水。道家常概,不言学问二字,恶其貌则是,其中则非也。辛巳夏四月,托迹于匡庐秀峰寺,凡三越月,诸凡名胜,无不游览。一日抵木瓜洞,与嵩隐道人遇,……泊晚让榻,卧余几前。经书数卷,笔砚莹彻,毫无尘俗气。余曰:“幽人贞吉,其是之谓乎?”次早,食,余将告别,从容叩其学问根底,以“知止”二字应。余闻之矍然曰:“此道学要诀也。”凡学之所以不醇者,欲害之。人心之所以多欲,由妄念起,而心不安其宅也。若知止则心有专。主念不忘,动定静安,虑一以贯之。入圣超凡,指归不远。《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躬。”胥此物

也,学道者宜知,学禅者宜知,学儒者亦宜知也。生平注有《黄庭》、《虚静》、《阴符》诸经,《指元篇》、《三洞元审》、《心经解》诸语录。读其书者知之,余不具论。……余惟言其学问指宗,以告后之有志学道者。道人年八十有九,己丑岁羽化而去。^{[18] (P72-73)}

如上所述,石和阳所学之道,并非“点砂烧丹,吐纳运化”之道,而是“学问”之道、“知止”之道。刘氏希望阐明其“学问指宗”,以启迪“后之有志学道者”。

康熙甲午年(1714)任星子知县的毛德琦,在《题庐山木瓜洞道存篇序》中,指出石和阳之“道”即理学之“道”:

今以人所同得而虚灵不昧者,谓之明德;以人所共由而无往勿屈者,谓之达道。道也者,原于天命之性,而实行乎寻常日用间。初非有幽远难穷之理,此圣学所以独尊于天下也。自异学峰起,依浮屠者谈心性,而流于寂灭;附老氏者谈道德,而遁于虚无。各相标榜,而道之为道,遂判然其殊途矣。予于甲午岁来蒞星渚,考其风土人物,匡庐彭泽而外,有名木瓜洞者,唐真人刘混成种瓜处。明季有石嵩隐道人栖息于此,迹其著述,如《黄庭》、《虚静》诸注,《指元篇》诸语录,至今究心理学之士,犹乐得而称道之。……其徒尹诚斋……叩以理学指归,则以知止对,穷流溯源,应答井井,夫非所学之有本欤!及出其师所遗《观心直指》篇,有“有心之未有心,无心之未无心”等语,则又领会于无极、太极之蕴,适足以表彰性学,羽翼吾道,不惟与浮屠有间。^{[18] (P77-78)}

毛德琦认为,石和阳所著的《观心直指》篇,深刻领会无极、太极之底蕴,对于弘扬理学颇有价值。正因为如此,石和阳得到了各级地方官吏的赏识与推崇,不仅为之树碑立传,载之志书,而且为之编辑书稿,阐明学术,为世人塑造了“亦儒亦道”的文化象征。

自石和阳师徒之后,木瓜洞趋于荒废^{[20] (P339)}。这不禁让我们想到,石和阳“亦儒亦道”的历史形象,不过是为了迎合国家认同的需要,反映了康熙时期文化建构的时代特征。至于石和阳是否具有高深

的道学与儒学造诣,在庐山文化上究竟有何历史地位,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容当另文探讨。

四 结语

近年来,由于“新清史”^{[21][22][P359-367][23][24][25]}的挑战,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问题颇受关注。常建华在《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一文中指出,研究者应跳出汉族本位与满族中心的藩篱,试着从国家认同的视角寻求突破。作者认为,清初帝王试图通过增加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君王入祀帝王庙、巡幸及“圣训”等接续治统等举措,获得清政权的政治合法性;通过祭孔子庙、辑刊《朱子全书》、经筵日讲、设南书房、修书编史、宣讲圣谕,推行教化、完善元明以来的旌表节孝制度及移风易俗等崇儒重道的举措,来换取汉人的心理服从。有了这种接续治统的政治认同与崇儒重道的文化认同,再加上通过使用多种语言文字、改土归流、边疆民族的儒化、乡约制度的普及等措施建立起来的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清政权的国家认同就得以实现,其统治中国成功的秘籍即在于此^[1]。这一以典籍文献为核心史料的宏观学术视野,与其他类似的相关研究成果^{[26][27]}无疑把清代国家认同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过,从地域社会的角度,清朝统治者究竟如何建构国家认同?又是如何面对当地既有的历史文化传统?这无疑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考察康熙时期庐山的文化建构,探讨清初江西地方官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策略及其历史影响。

在康熙五十八年至六十一年(1719—1722)的前后4年时间里,江西地方官绅编纂了三部庐山文献,分别为《庐山志》《白鹿书院志》及《庐山秀峰寺志》。通过解读这些地方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帝王的影子在这里很少见到。他甚至没有到过庐山,只凭简单的两块“方针性”扁额,就让诸多地方官绅、僧人及道士一心向化。从儒家的紫阳祠,到佛教的“僧名儒行”,再到道教的“亦儒亦道”,建构了一幅以“儒”为中心,释、道合于儒的和谐画面。在这场文化建构活动中,地方官绅是主力军,而御赐扁额、修建庙宇、编纂志书及典型人物的形象塑造,是建构清朝国家认同的主要手段与方式。在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到清初江西国家建构的“区域模式”,也不难发现清朝国家认同对庐山文化建构的深刻影响。

清初江西建构国家认同的文化策略,造就了白鹿洞书院、秀峰寺与木瓜洞一时的繁荣,使之在经历

若干年的颓废或是沉寂状态后,以一个有机的整体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清代庐山的文化中心。时至今日,庐山作为中国第一个被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名类的文化遗产^[28],白鹿洞书院、秀峰寺与木瓜洞都已成为承载庐山文化的重要遗产单体。如何揭示这些文化景观之间的相互演替及关联性,已经成为研究者的首要任务^[29]。那么,重新回顾康熙时期庐山文化的建构过程,对于深入揭示庐山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内涵,自然也就具有新的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 [1]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J].清史研究,2010(11).
- [2]陈晓鸣.中心与边缘: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1858—1938)[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
- [3]许怀林.江西史稿[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
- [4]龚志强.渐进与跨越:明清以来庐山开发研究[D].广州:暨南大学,2010.
- [5]杜玉玲.地方文献与文化建构:历代庐山文献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4.
- [6]陈舜俞.庐山记:卷2·叙山南篇第三[G]//吴宗慈.庐山志.铅印本.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1933,上海:上海仿古书局,民国二十二年.
- [7]朱瑞熙.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8]胡适.庐山游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民国十七年).
- [9]周奎书.千年学府——白鹿洞书院[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 [10]李才栋.白鹿洞书院考略[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85(4).
- [11]李宁宁.白鹿洞书院艺文新志·紫阳祠记[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 [12]范昌治.中国佛寺志丛刊·庐山秀峰寺志[M].扬州: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
- [13]范初.续庐山纪事[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第22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
- [14]李凤花.宋荦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7.
- [15]宋荦.漫堂年谱[G]//续修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第55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 [16]潘耒.游庐山记[G]//吴宗慈.庐山志.江西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上海:上海仿古书局,1933(民国二十二年).
- [17]桑乔.庐山纪事:卷6[M].明嘉靖四十年刊本影印版.台北:成文出版社,1989.
- [18]毛德琦.庐山志:卷7[M].康熙五十八年刻版,民国四年修补本.

- [19] 吴宗慈. 庐山志 [M]. 胡迎建, 校注.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6.
- [20] 吴国富. 庐山道教史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 [21] 江风. “新清史”之争: 超越政治, 可能吗 [N]. 中华读书报. 2012-08-22(9).
- [22] 张婷. 漫谈美国新清史研究 [J]. 满学论丛: 第 1 辑. 2011(11).
- [23] 刘凤云. “新清史”研究: 不同凡响的学术争鸣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10-14(4).
- [24] 贾建飞. “新清史”刍议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0-03-16(13).
- [25] 卫周安. 新清史 [J]. 董建中, 译. 清史研究. 2008(2).
- [26] 刘方玲. 清朝前期帝王道统形象的建立 [D].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 [27] 黄爱平. 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 [J]. 清史研究. 2011(2).
- [28] 中国庐山政务网 [EB/OL]: <http://www.china-lushan.com/heritage/#why>
- [29] 卢娜.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庐山文化景观解读及旅游意义 [D]. 成都: 四川师范大学, 2011.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Mount. Lu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DU Yu - 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Library ,Jiangxi Norm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2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national identity ,Cheng - Zhu Neo - Confucianism is respected and admired in ideology and culture sphere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Governors ,high officials and local squires in Jiangxi ,who abide faithfully by the will of Emperor Kangxi ,advocat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fucianism ,centered in Mount. Lu ,which indicates the strategies of establish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revival of White Deer Cave Academy ,the foundation of Ziyang Temple ,the extending of Xiufeng Temple and ChaoYuan as both Confucianist and Monk ,rising of Mugua Cave and Shi Heyang as both confucianist and Taoist.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ocess helps us comprehend connotation culture in Mount. Lu.

Key words: the reign of emperor Kangxi ,Mount Lu;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construction; culture heritage

(责任编辑 书华)